

CAMBRIDGE

启蒙运动研究译丛

财富与德性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匈] 伊什特万·洪特 [加] 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 编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李大军 范良聪 庄佳玥 译
罗卫东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013058703

启蒙运动研究译丛

F095.614
04



财富与德性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匈] 伊什特万·洪特 [加] 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 编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李大军 范良聪 庄佳玥 译
罗卫东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65221

F095.614
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
〔匈〕洪特，〔加〕伊格纳季耶夫 编；李大军，范良聪，
庄佳玥 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5

书名原文：Wealth and Virtue

ISBN 978-7-308-11429-5

I. ①财… II. ①洪… ②伊… ③李… ④范… ⑤庄…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苏格兰—18世纪

IV. ① F095.6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2851 号

财富与德性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匈〕洪特 〔加〕伊格纳季耶夫 编

李大军 范良聪 庄佳玥 译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营销编辑 刘 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88千

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429-5

定 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总 序

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在脱离了希腊化的时代之后，进入了中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沉睡，直到被启蒙运动彻底唤醒。

启蒙本质上是人类在思想认识领域中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按照康德的著名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启蒙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陷入若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运用自己理智的蒙昧状态。没有启蒙就不可能有自我清明的人生状态，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的幸福；没有经过启蒙的公民，也就不可能有合乎人类根本目的的社会生活；没有启蒙思想推动的科学发现，就无法应用、评估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制度和技术，并使之造福人类社会。一言以蔽之，18世纪前后发生的启蒙运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面目，造就了今天的世界。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的自我认识，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以及人类应有的自信与尊严。与此前曾经发生过的各种人类解放运动不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其特有的方式牢固地确立了世界——自然的世界、人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的可认识性的观念，指出了人类摆脱自我蒙昧状态的方法和方向。启蒙时代的人们，无论是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或情感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如何深刻，如何看上去多么不可调和，都截然不同于以往。他们具有对人类自我认识能力及其限度的高度自觉和自信，甚至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也可看作是总体上和诣的启蒙大合唱的一个必要的声部。我以为，这也正是启蒙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人类近两个世纪的进步都是这个财富不断呈现的产物。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人类皆

可说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孩子。

启蒙运动降下它巨大的帷幕至今已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似乎处在截然不同的两极。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地方，或者是，启蒙思想作为一种似乎完成和实现了的观念不再能够引起大家热切的关注。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止于思想史的需要，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仿佛已不再存在。或者甚至，反启蒙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时尚。而在另外一些场合，随处可见的现象依然是，人类的精神处于基本蒙昧状态，迷信、偏见、原始观念团团包围着人们的心灵；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必要性迫在眉睫，可希望依然渺茫。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又经过了近一个世纪，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迄今也有快一个世纪了。在这伴随着急剧社会变革的百年之中，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答案未必是完全肯定的。就康德意义上的启蒙而言，今天中国人的深层精神结构，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形相去不远。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基本上仍然是外生变量的结果，中国人的心灵、精神和心理世界还停留在前启蒙阶段。启蒙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一项未完成的自我革命。令人担忧的是，国人并未对此有充分的自觉。毋宁说，由于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里的巨大成功，助长了中国人的一种未经反思和批判的、盲目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遮蔽了启蒙这一重要任务之于中国的迫切性。拿破仑当年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此话也许说对了一半。它的另一半应该是：能够唤醒中国这头睡狮的除了启蒙，没有其他！

推动中国人的启蒙，乃是新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得以安身立命的事业，也应该是他们展示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事业。做好这件事情的前提，无疑地，在于知识分子应完成自身的启蒙。

伟大的启蒙运动涉及人类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涉及的国家也众多。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思想和学术的论争此起彼伏，理论创新层出不穷。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发生的一切对于中国这样正迎接着新的启蒙时代的国家，对于我们这些需要启蒙的人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唤醒这个记忆，使其成为一面镜子，用来照鉴我们的事业，这是有必要的。

有鉴于此，我们志同道合的一帮学界朋友策划了几套关于启蒙的书

籍，包括三个系列，即：“启蒙运动经典译丛”、“启蒙运动研究译丛”和“启蒙运动论丛”。“启蒙运动经典译丛”旨在译介18世纪前后启蒙运动重要思想家的经典作品，其重点一是长期以来被中国学术界忽视的重要思想家的作品，不少是首次以中文本形式问世，二是因研究深入而重新翻译的新中文版。这套译丛自启动以来已有多种作品问世，在学界也引起了一定的积极反响。“启蒙运动研究译丛”则主要译介当代西方学术界研究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正分批出版。“启蒙运动论丛”重点展示中国学者研究启蒙运动的学术成果，目前正在组织之中。

但愿，这三套丛书不仅能为国内知识界和思想界提供有关启蒙运动的新知识、新材料和新视角，还能推动中国学界的启蒙运动研究。同时，也许更重要的，能为中国自身的启蒙实践，为知识分子参与推动中国启蒙的行动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罗卫东

2010年秋

译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是最近三十年以来国际学术界引用较多、影响较大的、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思想理论的代表性作品。

本书的论题覆盖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所研究的学者既包括洛克、休谟、斯密这些早就为中国学术界熟知的人，也涉及哈奇森、弗格森等正在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人物，甚至还有专章来讨论此前基本上不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的那些人物及其思想，他们曾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弗莱奇、凯姆斯、卡迈克尔、斯图尔特、米勒等。至于论及的历史人物就更多了。当然，尽管论题范围比较广泛，但正如本书副标题所示，它的重点在于考察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确切地说，本书的各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切入这样一个主题，即，以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潮之间到底有着何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性。对中国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主题。长期以来，我们所接受的主流理论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标准来研究、衡量和评价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发展历程及相关人物的贡献的。根据这种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始于威廉·配第，经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达到了顶峰。这也为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在其《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确立起来的考察政治经济学说史的范式被反复形式化乃至教条化以后，积淀成为几代中国学者的思维定式。

马克思试图揭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发展以及达到高峰的机理，他的努力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理论体系的某些此前不被察觉的特

性，特别是其阶级属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考察是从属于剩余价值学说这一总体框架的。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作为其基本的概念范式，对历史（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思想的）经过了某种特殊的处理，抽象了大量内容，旨在更好地贯彻他自己的理论使命。仔细阅读和深入马克思的作品，可以发现他自己对这样处理的前提和局限条件有着相当的理论自觉。但是，一百多年来，后人出于各种特殊的需要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机械化、形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解读，这样的理论自觉已经日益式微。受此影响，中国学术界关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的认识也就难以避免地存在严重的缺陷。最近三十余年来，随着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不断深入，西方学术界已经逐步复原出一个非常生动的历史情境，以帮助我们更加丰富，也更加深入地认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背景。

本书的研究表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被创立并在最初阶段就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哈奇森、休谟、斯密这些苏格兰启蒙思想运动的领袖们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秉据的特殊问题意识。具体而言，这些思想家，无论彼此之间在知识背景、个人气质以及社会政治地位方面具有多大差异，都关心一个极为迫切而深刻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经济又相对落后的体系中，如何能够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进步，达到国富民强。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来源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祖国——苏格兰这样一个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1707年与经济上先进的英格兰实施合并这一历史变化。

事实上，苏格兰与英格兰，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不共戴天的仇家。与南部的近邻英格兰相比，苏格兰更愿意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交好。如果不是苏格兰在1559年左右爆发了宗教革命，新教徒取得了国家权力，也许这一切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在新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后的苏格兰，与同样以新教为国教的英格兰之间终于开始有了某些基于宗教的共同利益。1603年发生的王位联合事件，将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个曾经的仇敌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此后一个多世纪之内，苏格兰事实上日益成为经济力量更加强大的英格兰的附庸。苏格兰的经济实力本来就显著弱于英格兰，其发展腹地小，没有海外殖民地提供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作为支撑，产业发展空间狭小。加之王位联合以后，实际的

政治运行中，苏格兰议会的权力受到英格兰的钳制和抵消，几近名存实亡，在贸易、外交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苏格兰实际上丧失了自主权，根本无法维护本国利益。事实上，王位联合加剧了苏格兰经济上的贫弱局面，也激化了国内矛盾。因此，对苏格兰人来讲，要么抛弃王位联合模式，彻底回归到1603年之前时代的自主模式，要么与英格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并。围绕苏格兰前途和命运的激烈讨论在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从未停止过。在思想界，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纷纷卷入了关于苏格兰政治经济前途的争论。可以说，民族感情很深厚、自主意识很强的苏格兰人，尤其是普通的苏格兰国民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祖国与英格兰合并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在18世纪上半叶的复辟活动之所以能够造成一定影响，与这一社会基础不无关系。但是，很多有识之士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实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对国际社会实现进一步的开放和合作，尤其是如果不能与强大的英格兰合作，苏格兰就无法实现富强，保持自己的民族尊严。这样一方面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沉的情感，另一方面是基于强烈发展的愿望及对严酷外部约束认识的理性分析，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张力转化成为苏格兰知识界活跃思想创新的基本动力。

由于经济的不断恶化、大饥荒导致国民生活的困顿、海外投机活动失败造成的惨重损失等一系列因素，加上一部分苏格兰贵族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倾向，在18世纪初，天平迅速向赞成合并的一派倾斜。1707年1月16日，苏格兰议会以110票赞成、41票反对通过了合并法案的全部条款。最终通过的合并法案共包括25个正式条款及3个附加条款，在这25个条款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多达15条。条款中给予苏格兰人以贸易自由；取消了航海条例的限制；取消了关税壁垒；还规定由英格兰拨出资金，作为苏格兰分担英格兰国库债务的补偿，在实际操作中，这笔资金也被用于向在达瑞恩计划中蒙受经济损失的苏格兰投资者提供补偿。除此而外，条约还包含了在苏格兰征收更轻的税收及每年向苏格兰投资发展工业等内容。同年5月1日，《英格兰及苏格兰王国合并法案》正式生效，苏格兰王国和苏格兰议会都成为逝去的历史。

合并法案虽然生效，但无论是对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合并，都说不上已经完成，更说不上成功。在实施合并后的数十年里，苏格兰人都面临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那就是合并的政治经济效应到底会是什

么，如何才能确保合并有利于苏格兰的利益。当时的苏格兰知识界和文化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正是，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现实政治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冲突的两个国家，在合并后的时代如何相处，才能实现有益于双方的有机融合。从静态上看，只有从本质上把握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层结构，才有可能予以解答；而从动态上看，这又是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问題。其实我们很容易在斯密的《法理学讲义》和《国富论》中找到他思考和回答上述问题的主要轨迹。

总之，苏格兰这样一个经济上弱小的国家与经济实力远远强于它的英格兰合并的这件事所蕴含的尖锐的历史矛盾，促使各路人马深入思考经济发展、政治转型、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或许是导致苏格兰启蒙思想蓬勃兴起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也是这一思想学派具有浓厚特色的一个缘由。

本书各篇文章的论题看似散漫，出现在书中的人物众多，主题不容易把握，但若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斯密是本书实际上的主角。全书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斯密的《国富论》的问题意识及其真正贡献这样一个主题来展开的。众所周知，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为斯密的这部经典之作编织了鲜艳的花环，将其誉为经济学的“圣经”，但对它的真正主题以及与后来经济学发展之间的联系，则不甚关心。正因为如此，后人对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贡献和当代意义也就不可能深入认识和准确评价，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即使是如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不曾从头至尾认真读过一遍《国富论》。学术界对斯密的伟大贡献津津乐道，但似乎并不清楚这种贡献之所以伟大的缘由以及伟大的具体内涵。我认为，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不断发生摇摆，并且似乎日益偏离正确方向的状况，正与此相关。国际思想史界在《国富论》问世两百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重新研讨这一主题，其实非常有必要。本书的各位作者把斯密及其作品置于一个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帮助作者以“同情的理解”之方式进入当时的历史之中，帮助读者理解那一代苏格兰知识分子，特别是斯密的问题意识以及理论贡献的多个维度。

撰写本书各篇论文的作者，都是欧美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者，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存在深

刻的分歧，但是其视角的独特、分析的深度以及观点的新颖将会让中国知识界耳目一新。虽然，本书问世以后，国际学术界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化，出现了更多优秀的成果，但本书的历史作用始终未被超越。相信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会为中国学术界提升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水平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经济学日益剔除历史文化因素，远离真实世界，无视人类基本价值关怀，逐渐蜕变为应用数学分支的今天，回顾它的祖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及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机理，面对斯密等学科拓荒者们当年深沉的理论使命和历史责任心，缅怀他们的伟大思想贡献，不由得让人深思：当代社会经济理论该何去何从？！

是为序。

罗卫东

2012年夏于杭州

正是由于过去十五年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复兴，使编写这样一本书成为可能。这本新书，尤其与乔治·戴维（George Davie）、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罗纳德·米克（Ronald Meek）、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尼古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约翰·波科克（John Pocock）、安德鲁·斯金纳（Andrew Skinner）和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几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贡献使得对苏格兰法理学、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其在苏格兰乡土文化与都市政治起源中进行新的复杂解读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对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以及1641年、1688年和1776年三次英国革命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对大陆自然法理学传统的研究，以及对英国新哈林顿式（neo-Harringtonian）和马基雅维里式（Machiavellian）市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1]的研究，使得在欧洲政治、道德和法律哲学主流传统的地图上界定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位置至新的精确度成为可能。这本书试图评鉴这些研究成果。该想法具体产生于1979年5月在剑桥国王学院召开的一次关于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和市民人文主义传统的非正式座谈会。

[1] 在本书中，在描写公民时常常出现两个重要的词汇：“civic”与“civil”。这两个词都具有公民的含义，但是在不同时期，其指向的重点并不一样。从语境上看，“civic”一词主要是与德性、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它更多的是在描述古典共和国或者城邦中的一种身份。比如，在第9篇文章中波科克就提到，获得这种身份的前提在于一个人必须是家庭、武器装备以及财产的所有者，他们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政治含义是其核心所在。而“civil”一词则更多的是与自由、商业和交易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在强调商业社会中的人所拥有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在本书中，为了区分这两者，我们把“civic”翻译为“市民”，而把“civil”翻译为“公民”，对于其名词形式“citizen”以及扩展“citizenship”，则分别译为“公民”与“公民身份”。——译者注

会上，伊什特万·洪特、尼古拉斯·菲利普森、约翰·波科克、约翰·罗伯特森（John Robertson）和弗朗哥·文丘里（Franco Venturi）宣读了各自的原创性论文。本书其余部分或是在这之前的系列研究班中做过讲演，或是为本卷出版所作的委托稿。为出版此书，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重写和引申。本书的开篇之作是我们合写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内容介绍，但它确实突出了本书在总体上进行解析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苏格兰政治经济学语言体系中，应该赋予市民人文主义和自然法理学传统相对多大的权重。

viii 我们非常感谢下述机构和个人在促成本书出版中的帮助：国王学院的院长和研究人员，还有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尤其感谢约翰·邓恩（John Dunn）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感谢他们决定将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项目置于优先位置，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智力合作之谊；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帕特里夏·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和斯蒂芬·巴尔（Stephen Barr），感谢他们在本书漫长的酝酿期中表现出的耐心和理解；感谢研究中心的秘书黑兹尔·克拉克（Hazel Clark）女士，感谢她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的耐心和技巧。我们将铭记我们对以下这些人士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在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系列研究班中讲演自己的作品：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杰里米·卡特（Jeremy Cater）、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ie）、乔治·卡维（George Kavie）、托马斯·迪瓦恩（Thomas Devine）、邓肯·福布斯、大卫·科特勒（David Kettler）、阿拉达尔·马达拉兹（Aladar Madarasz）、罗莎琳德·米奇森（Rosalind Mitchison）、查理·芒恩（Charles Munn）和安德鲁·斯金纳。

我们希望把本书献给一位老师和朋友，拥有爵士头衔的 M. M. 波斯坦（M. M. Postan）教授，他支持我们进行此项研究，但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此项研究的首批成果。

伊什特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

大卫·休谟的著作

《哲学著作集》(*Philosophical Works*) 《大卫·休谟哲学著作集》(*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T. H. 格林 (T. H. Green) 和 T. H. 格罗斯 (T. H. Grose) 编, 4 卷本 (伦敦, 1874—1875)。

Treatise 《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L. A. 塞尔比·比格 (L. A. Selby Bigge) 编, 第 2 版, P. H. 尼迪奇 (P. H. Nidditch) 修订 (牛津, 1979)。

亚当·斯密的著作^[1]

《早期手稿》(*ED*) 《国富论》的部分“早期手稿”(“Early Draft” of Part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载于 *LJ* (A)。

EPS 《哲学论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W. P. D. 怀特曼 (W. P. D. Wightman) 和 J. C. 布里 (J. C. Bryee) 主编, 连同杜格尔·斯图尔特 (Dugald Stewart) 的“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Account of Adam Smith), I. S. 罗斯 (I. S. Ross) 编 (牛津, 1980)。

TMS 《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D. D. 拉斐尔 (D. D. Raphael) 和 A. L. 迈克菲 (A. L. Macfie) 编 (牛津, 1976)。

LJ (A) 《法理学讲义 (1762—1763)》(*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Report of 1762-1763*), R. L. 米克, (R. L. Meek)、D. D. 拉斐尔、P.

[1] 对这些著作的处理参照《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与通信集》的编辑所采用的做法, 即不是引用页码, 而是表明相关章节和段落。如“WN I X.b.1”即为《国富论》第 I 卷第 X 章第 b 节第 1 小节。

G. 斯泰因 (P. G. Stein) 编 (牛津, 1978)。

LJ(B) 《法理学讲义或注释, 源自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关于司法、民政、岁入与军备的讲稿 (1776)》(*Jurisprudence or Notes from the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by Adam Smith,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Report dated 1776*), R. L. 米克、D. D. 拉斐尔、P. G. 斯泰因编 (牛津, 1978)。

《国富论》(WN)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 斯金纳和 W. B. 托德 (W. B. Todd) 编, 2 卷本 (牛津, 1975)。

《通信集》(*Correspondence*) 《亚当·斯密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 C. 莫斯纳 (E. C. Mossner) 和 I. S. 罗斯编 (牛津, 1977)。

目 录

《国富论》中的需要与正义：一篇介绍性的文章 /	1
截至 18 世纪的第三个 25 年，苏格兰经济发展如何？ /	53
格肖姆·卡迈克尔与 18 世纪苏格兰自然法理学 /	86
苏格兰讲席教授与上流学院（1720—1746） /	102
从应用神学到社会分析：约翰·洛克与苏格兰 启蒙运动之间的断裂 /	136
市民传统范围内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	156
作为市民道德家的亚当·斯密 /	199
商业社会的法律需求：凯姆斯勋爵的法理学 /	226
剑桥范式与苏格兰哲学家：18 世纪社会思想的市民人文主义 和公民法理学解释之间的关系研究 /	262
亚当·斯密“不朽而独特的贡献”： 一个政治与世界主义的视角 /	283
苏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富国穷国”之争 /	301
约翰·米勒与个人主义 /	354
苏格兰启蒙运动在 18 世纪意大利的回音 /	386
索引 /	408
译后记 /	432

《国富论》中的需要与正义：

1

一篇介绍性的文章

伊什特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

既然……在斯密看来，这样的社会是不幸福的，其大部分人遭受苦痛——然而，甚至社会最富足的状态也会导致大多数人的这类不幸——既然经济制度（一般说来建立在私人利益基础上的社会）带来了这类最富足的状态，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制度的目标就是社会的不幸福。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

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确信是繁荣和幸福的，如果其绝大部分成员处于贫穷和悲惨的境地……

事实上，与大部分人的奢华相比，（劳动者的）居所看上去无疑肯定极其简陋随意——然而，这样说可能没错，一位欧洲王储的居所并非总是大大超过一位勤劳节俭的农民的居所，因为后者的居所超过了很多非洲国王的居所，虽然这些国王是成千上万裸体野人生命与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掌控者。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卷，第1章和第8章）

如果不叙述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尽力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无法清晰地定义18世纪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相应的，这就要求我们能够理解斯密分别作为道德哲学家、法理学教授和政治经济学家时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本文认为，存在一个关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核心问题。斯密在其道德哲学、法理学讲义以及“早期手稿”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这正是《国富论》最后版本中斯密优先要回答的问题。在财产分配上，商业社会比先前任何社会阶段都更加不平等。